

Gandhara 犍陀罗

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

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

陆水林·译

张超音·摄影

王心阳·图片文注



Gandhara 犍陀罗

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

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

陆水林◎译

张超音◎摄影

王心阳◎图片文注





ISBN 978-7-5085-1629-5



9 787508 516295 >

定价：190.00元

犍槌

Sanchhara

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

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
Mohammad Wali Ullah Khan

陆水林◎译
Translated by Shuilin Lu

张超音◎摄影
Photos by Chaoyin Zhang

王心阳◎图片文注
Plate captions by Xinyang Wang



新疆人民出版社

巴基斯坦大使马苏德·汗致辞

数千年以来，巴基斯坦的国土不仅一直是一种，而且是多种文明的摇篮。伊斯兰堡附近索安河谷的石器表明五万年以前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居住，而人类最早的定居和农业生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

五千年以前，印度河流域文明处于全盛期。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出现了雅利安人的文明，接着是犍陀罗文明的崛起，而在其之后迎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出现又为这片土地平添了另一个丰富的文明层面。迈赫尔加尔、哈拉帕、莫亨佐·达罗、塔克西拉、恰萨达、白沙瓦、拉合尔和木尔坦等城市都有这些文明的遗迹，都继承了它们的辉煌传统。

今天我们在巴基斯坦可以看到的是一种连接南亚、西亚、中东、中亚和东亚的文化级联。这些古代文明的软实力将最终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他们致力于和平、和谐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联合起来。这些（文化级联的）趋势已经存在，不过我们还得自觉地努力去重新发现并再次传播它们。

这些文明的潮流自组成今天的巴基斯坦的这片土地席卷整个南亚的同时，也帮助与中国建立了长久的联系。

印度河流域的土地是伟大的印度河的产物，正如中国大部分的土地都是长江所赠予的一样。许多世纪以来，印度河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繁衍、交流、方向和联合，它既构成了亚欧地理上的分割线，同时也成为了它们的链接。

大约3000年以前，地中海和西亚的部落及军队移居巴基斯坦的西北部，他们的希腊式政治体制和文明传统与佛教信仰体系的亚洲根源相结合。这一融合形成了辉煌的犍陀罗文明，随后影响了远至东部的中国的佛教艺术。

我们高兴地看到，由著名的巴基斯坦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撰写，陆水林先生翻译的《犍陀罗》一书以其全面的记述正将这部分巴基斯坦的文化遗产介绍给中国读者。著名的中国摄影家张超音先生拍摄的生动的、激动人心的照片使该书大为生色。张超音先生多次遍游巴基斯坦，拍摄了各种充满历史意境的风光照片。

我还要感谢王心阳女士孜孜不倦的努力把这项工作的各方接合在一起。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旅行者不断地造访书中所记述和描绘的地方。远在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出现之前，法显和玄奘就分别在5世纪和7世纪越过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山脉，造访了奇特拉尔、斯瓦特、恰萨达、塔克西拉、白沙瓦、拉合尔和克什米尔。这些朝圣者带回来的信息是和平、宽容与和谐。

书中简洁优美的文字在现代和古代文明之间，同时也在巴中之间形成了互动，通过共同的文明层面，在我们这两片国土及其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通过这本书和这些图片，我们自豪地与你们分享犍陀罗文明丰富、辉煌的景像。



Message from Ambassador Masood Khan of Pakistan

Pakistan's land has been a cradle of not one but many civilization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ossils in the Soan Valley, situated near Islamabad, indicate that homo sapiens, inhabited this land 50,000 years ago. The earliest human settled habitation and agriculture date back to 7,000 to 5,000 B.C.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flourished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Aryan civilization surfaced around 1,500 B.C. And then we saw the rise of Gandhara Civilization which in its wake ushered in Buddhism. The advent of Islam in the region added yet another rich civilizational layer to this land. The cities of Mehrgarh, Harappa, Moenjodaro, Taxila, Charsada, Peshawar, Lahore, and Multan have the remnants of these civilizations and are inheritors of their glorious traditions.

What we see in Pakistan today is a cultural cascade connecting South Asia, West Asia, Middle East, Central Asia, and East Asia. The soft power of these ancient civilizations will ultimately unite people of these regions in their efforts to bring about peace, harmon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currents are there but we have to make conscious endeavours to rediscover and re-disseminate them.

While these civilizational tides from (the land that now constitutes) Pakistan swept across the whole of South Asia, they also helped establish a lasting bond with China.

The land of Indus is the offspring of the mighty Indus River like the bulk of the land mass of China is the gift of the Yangtze River. Over the centuries, the Indus has given fertility, communication, direction and unity to the entire landscape. It constitutes a geographical divider as well as a link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Some 3,000 years ago, tribes and troop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and West Asia migrated to the north western part of Pakistan. Their Hellenistic heritage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civilization merged with the Asian roots of Buddhist belief system. This fusion shaped the magnificent Gandhara Civilization and later on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art in China and farther part of East China.

We are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is par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Pakistan is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Chinese readers in the form of a comprehensive narrative contained in this book Gandhara written by a reputed Pakistani archeologist Mr. Muhammad Wali Ullah Khan and translated by Mr. Lu Shuilin.

This book is adorned by vivid and breathtaking pictures by the famous Chinese photographer Mr. Zhang Chaoyin who has traveled to Pakistan several times to capture the diverse landscape of Pakistan drenched in history.

I also want to thank Ms. Wang Xinyang for her untiring efforts to bring this project together.

The areas described and depicted in the book have been visited by the Chinese travelers for centuries. Much before modern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ecame common, Fa Xian and Xuan Zang, in the 5th and 7th centuries respectively, crossed some of the tallest mountains in the world to visit Chitral, Swat, Charsada, Taxila, Peshawar, Lahore and Kashmir. What these pilgrims brought back was a message of peace, of tolerance, of harmony.

The vignettes captured in the book form an interface between modern and ancient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They build a bridge between our two lands and peoples through shared civilizational fault lines.

It is therefore a matter of pride for us share with you, through this book and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s, the rich and splendid landscape of the Gandhara Civilization.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overlapping loops and lines, positioned above a horizontal line.

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裁闫立金致辞

季羨林先生曾经说过“文化交流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人类社会的进步恐怕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发轫于数千年之前的诸多古代文明也是当时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成果。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生、发展、辉煌、传播、湮没也遵循这样的轨迹。

不过，东方文化价值的发掘与确认，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多少年常常是发现在本土、研究在国外，有失文化交流的客观与公平，东方学研究中的很多领域都曾经经历这样的痛苦与无奈。在过去20年的海外工作经历中，深深感受到对传播亚洲和东方文化的支持是每个企业机构和个人的责任，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这样的工作。

通过《犍陀罗》一书，很高兴巴基斯坦本土学者以自己的耕耘和努力在此领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和见解，并且这样的专著得以在中国出版，也可以看出文化交流能够在更深层面上承载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意愿。

欣闻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和民间文化遗产中心为此书在中国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中国摄影师张超音先后多次赴犍陀罗遗迹所在地考察与拍摄，付出了长久的热情和大量的劳动。现在五洲传播出版社将这一两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合作付梓出版，也可见悠久璀璨的文化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

了解才能无畏，这既是佛陀思想的基础，也应该是古今东西方文化和谐共融的境界。

闫立金

序

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而且常谈常新。从19世纪中叶发现犍陀罗佛像至今一百多年来，关于犍陀罗艺术的历史、成因与流变，特别是关于佛像的起源问题，仍存在诸多疑点、未知因素和不解之谜，引发了东西方各国学者的探讨、猜想和争论，迄今难以达成共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话题极其复杂、神秘，更容易唤起人们寻踪探秘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犍陀罗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谷地。而犍陀罗艺术分布的范围更为广泛，大体相当于今巴基斯坦西北与毗连的阿富汗东部地区，既包括印度河西侧的白沙瓦谷地，也包括印度河东侧的咀叉始罗(今译塔克西拉)，北到斯瓦特河谷，西至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上游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犍陀罗相传为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公元前326年又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公元前305年，孔雀王朝的开国皇帝旃陀罗笈多从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手中夺回犍陀罗。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第三代皇帝阿育王曾派遣印度传教使节来阐提到这里传播佛教。约公元前190年，巴克特里亚(大夏)希腊人又征服了犍陀罗，按照希腊城邦的模式重建了咀叉始罗的西尔卡普新城。传说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米南德(弥兰陀)，曾与印度高僧那先比丘讨论佛教教义，这段对话后来被编纂成佛教名著《弥兰陀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约公元前85年，中亚的游牧民族塞卡人(塞种人)入侵犍陀罗。约公元25年，犍陀罗又被伊朗北方帕提亚(安息)王国的帕提亚人占领。塞卡人与帕提亚人都信奉波斯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并仰慕希腊文化，也接受了印度文化。咀叉始罗的西尔卡普城址的双头鹰窠塔波，建筑结构呈现希腊化因素、印度因素与中亚因素混合文化的特征。有些学者便根据塞卡—帕提亚时代的文物，追溯犍陀罗艺术的发端。

贵霜王朝时代(公元1—3世纪中叶)是犍陀罗艺术的繁荣时期。贵霜人原系中国敦煌与祁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月氏的一支。公元前2世纪,月氏受匈奴逼迫西迁,约公元前130年占据巴克特里亚。公元1世纪初叶,月氏五部翕侯之一贵霜翕侯库朱拉·卡德菲塞斯(丘就却),在喀布尔河流域建立贵霜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大月氏。约公元60年,库朱拉之子维马·卡德菲塞斯(阎膏珍),征服了犍陀罗和北印度马图拉地区。贵霜王朝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约公元78—144年在位)又征服了东印度恒河流域中游,把贵霜统治中心从中亚移至犍陀罗,定都布路沙布逻(今白沙瓦)。迦腻色迦治下的贵霜帝国与中国、罗马、帕提亚并列为当时世界的四大强国。犍陀罗是中国与罗马之间通商的“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尤其密切。迦腻色迦信奉波斯拜火教,也赞助印度佛教,被誉为“阿育王第二”。传说迦腻色迦曾把印度大乘佛教哲学家马鸣罗致到贵霜宫廷,马鸣的长诗《佛所行赞》详细叙述了佛陀从诞生到涅槃的生平传说。迦腻色迦时代,在克什米尔举行了佛教经典的第四次结集,在犍陀罗地区建造了大批佛塔寺院,可能是希腊人后裔的宫廷建筑师阿吉西勒斯设计了白沙瓦近郊的迦腻色迦大塔。1908年在塔遗址出土的青铜舍利容器上铸有佛陀坐像。同址出土的“迦腻色迦金币”正面有迦腻色迦肖像,背面有佛陀立像,佛像旁镌刻着希腊字母铭文“佛陀”。迦腻色迦之后有瓦西什卡、迦腻色迦二世、胡维什卡、婆苏提婆等贵霜诸王。约公元241年,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公元224—652年)沙普尔一世攻陷白沙瓦,贵霜帝国瓦解。公元4世纪末,寄多罗贵霜人(约公元390—465年)复兴了贵霜残余势力。约公元465年,嚧哒人(白匈奴)入侵犍陀罗,毁坏了大批佛塔寺院。犍陀罗佛像也逐渐被埋在历史的尘土之下。

犍陀罗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佛像的出现与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印度巴尔胡特、桑奇等地的早期佛教雕刻,从未出现人形的佛像,仅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贵霜时代正处于印度佛教从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演变的阶段。大乘(大车、大道)佛教不强调追求自我解脱,而是标榜救度一切众生,把仅仅追求自我解脱的派别贬称为小乘(小车、小道),把宇宙的最高本体“如来”当作最高神来崇拜,认为佛陀释迦牟尼只是如来的暂时化身之

一，未来的佛陀——菩萨则是为普度众生而显现人形的救世主，是神化的超人或人格化的神。大乘佛教这种把佛陀神化、人格化的观念，恰恰符合犍陀罗地区流行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拟人说”即“神人同形”的造像传统。于是犍陀罗艺术家开始打破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惯例，仿照希腊、罗马神像直接雕刻出佛陀本身人形的形象，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犍陀罗佛像大约在公元1世纪后期从佛传故事浮雕中开始出现，逐渐向单独礼拜的佛像发展。犍陀罗的佛传故事浮雕多达一百多个场面，几乎表现了马鸣的长诗《佛所行赞》中的全部情节，而佛传主人公佛陀的形象完全以写实的人形刻画。犍陀罗佛像的造型，来源于印度佛教的观念，采用了希腊化艺术的形式。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可以说犍陀罗佛像等于希腊化艺术的写实人体加印度佛教的象征标志。犍陀罗佛像从整体上来看是由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式的头部，披着罗马长袍托格的身体，与某些标志着佛陀的印度伟人身份的相貌特征（三十二相中的肉髻、白毫、光环等）混合构成。这种希腊化风格的佛像，被称作“阿波罗式的佛像”或“穿托格的佛像”。

犍陀罗菩萨像的创造也是犍陀罗艺术的重大贡献。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音译略称，义为“觉有情”或“觉悟众生”，即候补佛陀或未来佛陀。菩萨为救度众生而推迟自己进入涅槃的时间，把众生从此岸的生死苦海拯救到彼岸的极乐世界。菩萨的大量出现是大乘佛教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印度早期佛教雕刻中，悉达多太子(菩萨)也是以伞盖、拂尘等象征物来暗示。贵霜时代的犍陀罗雕刻作坊制作了大批人形的王子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立像或坐像。菩萨是尚未脱离尘世浮华的圣人，因此犍陀罗的菩萨像在造型上比佛像活泼而华贵，酷似贵霜时代印欧混血的风度翩翩的王子。

在犍陀罗艺术中，除了大量佛传故事浮雕和佛像、菩萨像以外，也有一些异域诸神的雕像，诸如希腊雅典城邦的守护女神雅典娜、印度财神般遮迦与他的配偶生育女神诃哩帝(鬼子母，也译为诃梨蒂)等等。这些异域诸神雕像的造型都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犍陀罗艺术融汇东西方文化因素的特质。

在公元初期的几个世纪中，犍陀罗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从中亚向东扩散，东渐中国、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的范式。贵霜时代以降，来自犍陀罗或克什米尔的高僧在中国西域络绎于途，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人西行求法取经，也

曾途经犍陀罗地区，目睹了犍陀罗佛塔、佛像的庄严壮丽。中国新疆楼兰地区米兰佛寺的佛像，于阗地区拉瓦克塔院的佛像、菩萨像，明显取自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艺术。龟兹克孜尔石窟的塑像和壁画，杂糅了希腊化、波斯与印度的因素，有些泥塑的佛像、菩萨像与呾叉始罗和哈达的塑像相仿。据推测，最先传入中国新疆的犍陀罗佛像是迦毕试样式，迦毕试样式甚至影响到中国内地敦煌、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这种吸收了犍陀罗佛像因素的中国式佛像后来又传到朝鲜、日本。

1849年，英国人最先在旁遮普发掘出犍陀罗佛像。20世纪以来，英属印度、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的考古队纷纷在犍陀罗及其邻近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古代建筑遗迹、雕塑、工艺品等文物。犍陀罗艺术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物，因为涉及佛像起源的重大问题，所以引起了东西方各国学者一百多年研究、探讨和争论的兴趣。20世纪初期，法国东方学家阿尔弗雷德·富歇的巨著《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1905-1923），主要采用图像学方法详细说明犍陀罗雕刻的图像题材和形式要素。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1876-1958）1913至1934年主持呾叉始罗的发掘，发表了考古调查报告《塔克西拉》（1951），他去世后出版的《犍陀罗佛教艺术》（1960）主要采用年代学和美学风格分析方法研究犍陀罗艺术，试图建立考古年代与艺术风格的联系。不过，犍陀罗艺术的年代包括贵霜国王迦腻色迦在位的年代，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迦腻色迦即位的年代，国际学术界就有公元78、128、144年诸说，迄无定论。斯里兰卡学者A. K. 库马拉斯瓦米（1877-1947）是印度艺术史研究的权威，在佛像的起源问题上，他与法国学者富歇的意见相左，不同意最初的佛像是受希腊、罗马的影响起源于犍陀罗地区，而认为最初的佛像是受印度本土药叉的影响起源于马图拉地区。目前希腊、罗马起源说和印度本土起源说两派观点仍各执一词，在希腊、罗马起源说中又分为希腊起源说和罗马起源说两种意见。无论哪一种意见，还都缺乏考古学的确凿证据和年代学的准确判断的支撑。

犍陀罗的故乡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1905-1992）的乌尔都文著作《犍陀罗》（1988-1989），根据作者亲自在犍陀罗地区长期从事考古调查工作的经验，以犍陀罗艺术为中心，全面介绍了犍陀罗的历史、文化、宗教、雕塑和建筑艺

术，并在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的分期问题上对约翰·马歇尔的分期进行了修正。马歇尔把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1世纪初叶—3世纪中叶）以石雕为主，后期（约3世纪中叶—5世纪末叶）以泥塑为主。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则推测，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最早产生于咀叉始罗的灰泥塑像，可能稍早于白沙瓦与斯瓦特河谷的片岩石雕，泥塑和石雕两种流派都从公元1世纪延续到5世纪或更晚，没有间断。他这种观点虽然尚未获得国际学术界公认，但对犍陀罗艺术研究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的《犍陀罗》作为犍陀罗艺术入门的普及读物，对中国广大读者来说非常需要。因此北京大学东语系乌尔都语专业毕业的资深翻译陆水林，把本书从乌尔都文译为中文。现在关于犍陀罗艺术的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已有英国学者马歇尔的《塔克西拉》（秦立彦译）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王冀青译）、日本学者宫治昭的《犍陀罗美术寻踪》（李萍译）等书，而巴基斯坦学者的乌尔都文著作的中译本仅此一部。这在当代巴基斯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上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本书中文版的一大亮点是增加了大量彩色图版。这些图片大多是专业摄影师张超音在巴基斯坦的犍陀罗文化遗址和各博物馆实地考察时拍摄的。张超音二十多年来不辞辛苦奔走于中国西藏和巴基斯坦等地拍摄图片资料和摄影艺术作品，多次参加巴基斯坦国际犍陀罗艺术研讨会，他曾因出版《秘境之旅·巴基斯坦》摄影画册而荣获巴基斯坦总统勋章。他选用的高质量图片为本书增色不少，想必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王镛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译者说明

巴基斯坦学者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所著《犍陀罗》一书的汉译本《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由五洲传播出版社付梓出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对我国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对犍陀罗及其佛教雕塑艺术的介绍却很不够。译者十多年前翻译本书时能获得的参考书，不过五六种而已。这些著作于犍陀罗佛教艺术介绍甚详，但对犍陀罗本身的地理、历史、文化，涉及很少或无暇涉及。而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所著的这本书，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犍陀罗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材料。

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是巴基斯坦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和考古学家，毕生致力于巴基斯坦古迹的保护与研究，足迹遍布巴基斯坦各地。他于1905年9月10日出生于印度北方邦密拉特县默瓦纳镇一个帕坦人世家。其祖先原居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斯瓦比县玛奈里附近的苏尔赫泰里村，约于17世纪初移居印度，家族中有多人担任过莫卧儿王朝的官员。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于1927年毕业于罗尔基的托马森建筑工程学院，1928年8月末开始在印度政府考古局供职，从事古迹保护工作。从那时起，今巴基斯坦境内各种重要古迹的保护和维修工作都是在他的参与下或是在他的影响下进行的，若干博物馆的兴建也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他不仅以科学的方法维护各种古迹和文物，还与各种工匠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深入了解并掌握他们的技艺，使一些失传多年的古建筑工艺得以复兴。

巴基斯坦独立后，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后担任过巴基斯坦政府考古局主任助理、代理主任、主任等职。1965年9月退休后，还担任过旁遮普大学教授和旁遮普省宗教基金会项目主任、顾

问等职。1987年底，又重新出任旁遮普政府考古局局长、顾问，直至逝世。除考古与古迹保护外，他还担任过巴基斯坦塔建设委员会、拉合尔中央博物馆顾问委员会等多种委员会的成员或顾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繁忙的日常工作外，他还潜心著述。主要著作有《不同文化与文明的鉴别》（1959年10月28日—11月6日于拉合尔举行的地区世界青年大会出版）、《拉合尔的巴德夏希清真寺》（西巴基斯坦政府公共工程部建筑与道路局，1960年拉合尔出版）、《拉合尔及其重要古迹》（巴基斯坦政府教育部考古与博物馆局，1961年初版，1964年再版）、《西巴基斯坦的锡克教圣地》（巴基斯坦政府教育与新闻部考古与博物馆局，1962年出版）、《犍陀罗雕塑的发端》（罗马《东方与西方》杂志，1964年1月出版）、《拉合尔省督府》（旁遮普省政府新闻、文化及旅游局，1983年拉合尔出版）、《巴基斯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公元前1万年迄今）袖珍画艺术的发展》（巴基斯坦文化局出版，伊斯兰堡）等，此外，他还为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

为表彰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对研究、保护巴基斯坦古代文化所作的贡献，巴基斯坦政府于1968年和1971年分别授予他卓越勋章和巴基斯坦勋章。1983年，他荣获阿迦·汗国际建筑艺术奖；1985年又荣获卓越星章；1986年，巴基斯坦政府文化部所属国家民间与传统遗产研究所授予他民族遗产保护金质奖章。1992年2月27日，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不幸因病辞世。

本书为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先生晚年所著，是关于犍陀罗的唯一一本乌尔都文著作，由国家民间与传统遗产研究所出版，出版时间为1988年或1989年。著者曾在犍陀罗地区工作14年之久，在物质条件极为贫乏的漫长岁月里，主要靠步行进行实地考察，故本书除征引大量文献资料外，还能结合著者本人长期考察所得，对犍陀罗的地理沿革、历史兴衰、社会变迁，以及各种宗教和建筑艺术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使读者对犍陀罗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本书汉译本1997年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为压缩篇幅，删去了部分图片，也没有彩图。尽管如此，译本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刘家合、廖学盛主编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还将本书列入书目之中。这是我国第一部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本书得以列名其中，令译者深感欣慰。